

社区论辩：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的形态转变^{*}

黎熙元 陈福平

提要：本文围绕社会学理论中城市社区消失、继存和解放的学术论题，使用广州市三个不同类型社区的问卷资料，通过量化研究讨论了社会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形态的转变。分析结果指出，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的特征是：随着城市化程度和人口流动性的提高，居民的社会支持网逐渐从社区内转移到社区外，导致了居民的社区认同和社区参与减弱，即是说，由居民社会关系构成的自然社区向国家划分的行政社区以外扩散。这个研究结论显示，现行以“属地管理”为基础的社区建设模式能够达到的基层整合效果将越来越减弱。

关键词：社区论辩 社会支持网 自然社区 行政社区

二战前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城市化进程迅速展开。城市化和工业化对传统的、自成一体的社区产生了深刻的冲击，也造就了城市新的人际关系和群体、组织结构。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社区的不同类型进行研究，提出三个关于城市社区的基本论题：社区消失、继存和解放（community lost, saved, liberated）。

自改革开放后，城市化和工业化也在中国迅速展开，越来越频繁的人口流动和高速成长变化的产业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相对封闭和稳定的城乡社区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2001年前后，中央政府在全国城市推动社区建设工作，这项以投入公共资源来强化“属地管理”的工作使社区这个来自海外的概念为中国公众所认识。这样，社区在中国就获得了与西方学术界不太相同的定义，它是以城市的行政管理或政权建设的基层单位来划分或存在的；而不一定是自然形成的、邻里关系自成一体的居民区，虽然划分会考虑自然形成的社区，但两者不一定重合。那么，这样的城市社区是否也具有社会学定义的社区所具有的要素如人际关系、邻里关系、社区参与和社区团结呢？城市化和人口流动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城市基层社会再整合研究——作为一项社会政策的社会资本重构”（项目编号05BSH04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对这些社区产生了什么冲击?

本文的讨论是围绕城市社会学中关于社区的基本论题展开的,意图讨论今天中国城市社区的真实形态与传统中国社会学以及当代西方城市社会学中的社区之间存在的异同点,从中引申出社区建设作为社会转型期一项社会政策所应有的出发点与立足点。我们的分析将根据广州市三个不同类型社区的问卷调查资料,讨论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城市社区的存在状态,以及自然形成的社区与行政区划的社区在居民认知和行动参与层面的关系。

一、社区的论辩:消失、继存与解放

在社会学论述中,社区包括四个要素:具体的地理空间、人口、关系丛和社区团结或认同。研究者发现,在一个相对封闭、人口流动性低,内部结构自成一体的社区,人们的社会关系丛和认同往往是和他们所共同居住的特定地理空间相关的,有时甚至能够清晰地划分出相互的边界。这种社区研究结果反复出现,社区中个人的社会关系丛和认同就似乎与特定的地理空间具有必然的联系,换句话说,社区就是邻里关系。这种社区分析在观察一个城市化、工业化程度较低、人口流动性较低的社会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对以特定地域为基础的社会政策分析与实行来说是比较容易操作的。但是,这种社区分析在观察城市化程度和人口流动性较高的后工业化社会时就显得力有不逮。其原因恰恰在于城市化、工业化使人口流动越过了特定地域空间,破坏了稳固的邻里关系,个人的社会关系形态和认同也随之变得更具可变性。滕尼斯(Feinand Tonnies)创造“社区”一词,是把它作为大型现代化社会的对照物——小型的传统社会来使用的。滕尼斯在他的原著中并没有过多强调社区的地域因素和邻里关系,而是详细分析比较了社区和社会的内在基本结构,特别是个人社会关系的特征、组织特征和认同感等方面的差别。在当前的社区分析中,一些社会学者依然强调社区的地域空间因素和邻里关系(Gans, 1962: 106; Tilly, 1973);而另一些社会学者则更注重都市个人的社会关系形态及其认同的变化(Fischer, 1972; Wellman, 1979)。

在关于社区的论辩中,社区消失论产生最早、影响最大。其主要论

点来自齐美尔(Georg Simmel)和沃思(Louis Wirth)。齐美尔认为都市依靠规模庞大和结构复杂的科层组织来运作,城市经常变化的环境和科层化的组织运作改变了都市人的精神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性质特征,大都市人是理性和功利主义的(Simmel, 1950)。沃思提出大都市的三个典型特征是人口多、密度高和异质性强;城市中高度专业化的劳动分工破坏了传统社区共同体的团结,都市人的初级社会关系(primary relationships)是非个人的、短暂和零碎的;他们不是由团结、亲密的邻里或社区连结起来,而是由薄弱、无条理的次级社会关系网连结起来的(Wirth, 1964: 70—73)。齐美尔和沃思的观点对北美社会学界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后北美社会学对城市大众社会的论述,以及对城市社会各个侧面和城市社会问题如贫穷、犯罪、迁移等的研究都反映出亲密人际关系与社区支持和团结缺失、社会失序、个人主义泛滥等城市社会特征,从而或多或少地强化了社区消失的论断。

一些社会学者指出,社区消失论暗示了社会分工和科层化与个人的初级社会连带之间具有某种潜在的负相关。他们认为社会分工和科层化并没有弱化和割断个人的初级社会关系,人类能够在任何社会环境下继承传统同时适应新环境来建构社区。他们在20世纪中期提出了社区继存论。刘易斯(Oscar Lewis)和甘斯对少数族裔聚居区——“都市村庄”(urban village)的研究指出,亲密关系、社区团结和认同依然存在于城市某些地方,大都市的分工专业化和科层化并未破坏这些社区的特质,因此在他们看来社区没有消失,而是继续存在。

正如韦尔曼指出,社区继存论在批评社区消失论时忘记了社区消失论具有建设性的理论出发点——城市化怎样改变了社区以及个人的亲密关系形态(Wellman, 1979)。社区解放论放弃了社区必定具有某个特定地域范围的限定前提,把社区考察的关注点放在个人和组织的关系联结形态上。他们的研究指出,城市化改变了社区和个人关系的形态,它不再是紧密的、团结的和在空间上固定、重叠的,而是在空间上扩散的、关系的节点少、关系的强度较弱和多元化的,但是它对都市人来说仍然是社会化、获得社会支持和社会资源的重要来源(Fischer, 1982a: 257; Wellman, 1990)。换句话说,从个人社会关系丛的角度来看,社区已从具体的地理空间中释放出来。如果社区已经超越了邻里关系的范围,那么社区的边界怎样被识别出来呢?社区解放论者主张以个人社

会网的范围来界定社区的范围,正如韦尔曼所主张的:“把社区视为个人关系的网络”(Wellman, 1982: 66)。

二、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城市社区形态

“社区”这一概念在中国城市社会学的视野中一直都具有清楚的地域含义,其原因与下面的学术分析结论和政治实践相关。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城市都有这样的特点:(1)城市改造的速度较慢,人口的整体迁移较少;(2)在户籍制度和相关供给制度的控制下,城市人口的增长是相对稳定的,个体流动的可能性较小,城市居民的居住地点也相对固定;(3)市场的开放程度较低,个人收入增长的速度较慢,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流动可能性较小。这种低流动性的社会特点使许多城市居民家庭两、三代人居住在同一地点或同一所房屋;城市出现许多“都市里的村庄”。1949年以后中国城市基层政权建设的形式是以街道为界、按大致相近的人口规模(1—3万人之间)把城市划分为多个街一级行政区域,由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办组建居委会,负责基层行政管理和政治动员,并根据街居的布局配套设立各种相关行政机构和经济组织,由国家控制的公共资源也通过街居体系传送至基层,这种“属地管理”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同地而居的城市居民的共同利益和社区认同。2000年后中央在全国推动城市社区建设,把原来的基层单一行政管理模式改为居民自治与行政管理相结合的模式,其主要发展思路是由基层政治或行政组织发动和组织属地居民开展参与式的社区治理,而住户之间的关系也通过这些社区活动得以建立和加强。由此可见,“社区”这一概念在学界的视野和基层政治实践的层面都具有明显的居住地域含义。更确切地说,“社区”在社会学分析中指的是以邻里关系为主体的自然社区;而在今天的国家政治实践中指的是城市基层行政辖区,可以指街道辖区或居委会辖区。两者在实际划分时在某种程度上趋向一致,行政社区的地域范围一般比自然社区更大。

1980年以后中国城市发展的突出特征是城市化和工业化速度加快,城市更新改造加快和人口流动性大大增加,城市居民在收入提高之后能够自主选择和变换居住区,这些变化对过去几十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行政社区和居民个人的基本社会关系网络结构都产生了显著的冲

击。其一是居民的流动使邻里关系断裂,老住宅区出现了许多“空挂户”——住户户籍登记册上记录未变,但实际已人去楼空多年;而在新住宅区里,邻居之间互不相识,居民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支持来源与他们所住区域几乎没有关系。其二是社区人口不断变化,陌生人越来越多,新旧社区的异质性都大大增加,使邻里关系难以重建。

综上所述,如果说今天的中国城市社区仍然是那种地域分界、邻里关系都比较清晰的、同质的、团结的社区就值得质疑了。20世纪末期的国家体制改革以及城市化和工业化对城市社区的冲击是巨大的。今天,当我们仔细审视城市中个人的基本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支持来源时,不难发现社区其实存在许多差异,而不同区域的个人与社区关系的差异就更显著。

基于上述中国城市社区的发展特点和城市社会学的一般论题,我们得知邻里关系网络、居民参与以及认同是构成社区现实存在的三个主要因素。而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加快对这些因素有负影响,从而削弱了社区存在的基础。进一步来说,我们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1:在行政社区基础上,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邻里关系在个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重要性减弱。

假设2:由于邻里关系在个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重要性逐渐减弱,显示自然社区存在的社区特征也在逐渐消失。

三、数据与测量

本文使用的资料是2006年1—8月在广州市三个不同类型社区的问卷调查。这三个社区类型分别是:(1)城中村。该区位于广州市东端,据方志记载形成于清朝初期,是一个以三大家族姓氏为主体的自然居住聚落,2002年其行政管理纳入城市体系,改村委会为居委会,但依然保留集体出租土地收益的集体分配方式。由于该村是不久前才以村庄整体的方式纳入城市范围,而且保留了原有的集体分配制度,因此我们在分析中把它作为城市化程度最低、但制度因素影响最强的社区典型。(2)老城居民区。该区位于广州市西部,自清朝中期开始逐渐形成,居民住户之间没有血缘或家族的连带,但居住历史多超过三代。20世纪90年后,基于社区内居民迁出较多,该社区致力推动社区建设以

改善人口流动带来的问题,我们在分析中把它作为城市化程度和制度因素影响程度中等的典型社区。(3)商品住宅区。位于广州市西部,由几个大型房地产集团承建的几个新住宅小区组成,从90年代中期第一期商住楼落成至2006年在册住户已超过1000户。这个新落成的住宅区中居民迁入不久,流动性较大,实行小区管理方式。我们在分析中把它视为城市化程度较高、人口流动性大和制度因素影响较弱的典型社区。

选择这样三个社区分别代表传统的、过渡的和新兴的城市社区类型。在这三个社区以登记住户居民为基础,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各抽取300位居民(18岁以下、80岁以上者剔除)作为问卷调查对象,回收的有效问卷分别267、233和240,回收率分别为89%、78%和80%。问卷的问题涉及三方面内容:个人的社会网分布、对社区的认知和社区活动的参与。本文通过比较三种类型社区在这三方面的数据差异来描述分析不同社区类型的特点、自然社区与行政社区的差别以及城市化所导致的社区的变化。

(一)自变量——社区类型

基于数据样本,我们划分了三种类型的城市行政社区:城中村社区、城市老城区和新式的商品房住宅社区。这种划分大致反映了当代中国城市行政社区建设的两种空间逻辑。一是城市现代化。老城市社区包括单位住宅社区,由于城市改造和拆迁、单位体制的解体,商品住宅社区的大量出现,实际上大大改变了原有社区生活的运行机制。二是城市处于一个快速扩张的时期,许多原来的农村地区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形成了“城中村”这样的社区类型。因此我们选取了这三种社区类型作为我们研究的重要变量。在研究中,我们将分两个部分进行比较,一是城中村社区与老城区、商品住宅社区的比较;二是老城区和商品住宅社区的比较。

(二)中间变量(Intervening Variables)

社会支持的网络类型和来源。已有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支持网络一方面会受到居民个体特质的影响,包括年龄、性别、教育、收入、社会经济地位等个体性因素(Fischer, 1982b; Wellman & Wortley, 1990),同时也受到包括社区类型(蔡禾等, 1997; 张文宏、阮丹青, 1999; 张友琴,

2001;)、市场化的力量(丘海雄等, 1998)、职业结构(张文宏等, 1999)、经济生产方式(张其仔, 1999)、生活环境和社会文化(曹子玮, 2003; 王春光, 2000)等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使得个体的社会支持网络呈现出差异性。在这里, 我们基于城市社区的样本, 分析了社会支持网络的两个部分。一是城市行政社区的差异给社区居民支持网络带来怎样的变化; 二是这种变化对于地域共同体社区产生了什么影响。在韦尔曼等学者的社区网络研究所表达的亲密性社会关系的基础上, 我们选取了“当您情绪低落时想找人谈话, 您通常找谁谈?”“当您有金钱方面需求时, 您会向谁求助?”“当您遇到婚姻或感情问题时, 您通常会找谁谈?”“当您的家庭面临重大事件(如迁移、找工作), 您通常会找谁帮忙?”“当您在工作中遇到升降职、调职方面的问题时, 您通常会找谁谈?”这五个方面的问题, 分别代表了“情绪低落”、“金钱需求”、“婚姻情感”、“家庭重大事件”、“工作问题”五种支持网络类型。被调查者回答每种网络类型中最可能寻找的支持者一人。我们将该支持者与被支持者居住于同一社区之内取值为0, 支持者居住于被支持者社区之外的取值为1。本文将邻里关系操作化为社区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络, 当社区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络由社区之内转移到了社区之外, 则表明邻里关系在个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重要性减弱。我们从假设1可以得到以下推论:

推论1: 在行政社区基础上,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个人的社会支持网络将逐渐从社区之内转移至社区之外。

(三)因变量

沃尔多夫将邻里关系与情感划分为态度(attitudinal)和行为(behavioral)两个部分(Woldoff, 2002)。在本文中我们将把表达态度和行为的两个方面——社区认同和社区参与——作为显示社会学意义上社区特征的两个指标。

1. 社区认同

社区认同表达了居民对生活于其中的地域社区的意识、理解、爱护和支持(李友梅, 2002)。对于社区认同, 我们选取了五个问题: “社区建设我也出了一份力”、“参与社区事务是每个社区成员的职责和义务”、“社区组织的活动对我的发展有较大作用”、“我会尽可能参加社区里各种选举活动”、“我很关心报纸和电视对我们社区的报道”进行了量表测

量。我们对量表测量结果进行了赋分,“很同意”、“同意”、“一般”、“不同意”、“很不同意”分别计为 5—1 分。我们进行了因子分析,得到了如表 1 所示的社区认同因子。出于分析需要,我们将因变量“社区参与”转换为 1—100 之间的指数。转换的公式为:转换后的因子值=(因子值+B)×A,其中 $A=99/(\text{因子最大值}-\text{因子最小值})$, $B=(1/A)-\text{因子最小值}$ (边燕杰、李煜,2001)。

表 1 社区认同因子

项 目	社区认同	共 量
社区建设我也出了一份力	. 509	. 259
参与社区事务是每个社区成员的职责和义务	. 713	. 509
社区组织的活动对我的发展有较大作用	. 564	. 318
我会尽可能参加社区里各种选举活动	. 690	. 476
我很关心报纸和电视对我们社区的报道	. 724	. 524
特征值	2. 085	2. 085
平均方差	41. 703(%)	41. 703(%)

表 2 社区参与因子

项 目	社区参与程度	共 量
社区志愿者活动	. 695	. 483
社区文娱活动	. 673	. 453
社区体育健身活动	. 574	. 330
社区慈善活动	. 599	. 359
社区教育培训活动	. 739	. 546
特征值	2. 171	2. 171
平均方差	43. 421(%)	43. 421(%)

2. 社区参与

我们将社区参与项目(包括社区志愿者活动、社区文娱活动、社区体育健身活动、社区慈善活动、社区教育培训活动等项目)的量表(很经常、经常、一般、不经常、极少)用 5—1 分进行赋值,之后通过因子分析的方法得出社区参与的因子。

因此我们从假设 2 可以得到两个推论:

推论 2: 由于个人的社会支持网络逐渐从社区内转移至社区外, 居民对于自身所在社区的社区认同程度降低。

推论 3: 由于个人的社会支持网络逐渐从社区内转移至社区外, 居民对于社区各项活动的参与程度降低。

(三) 控制变量

1. 个体层次变量

由于个体因素会对社会支持网络、社区认同和社区参与产生影响, 我们控制了性别、年龄、教育、配偶情况、政治面貌、收入这些个体层次的变量。(1) 性别, 男性取值为 1, 女性取值为 0; (2) 年龄, 在模型中, 我们加入年龄的平方项, 以捕捉非线性效用(边燕杰、刘勇利, 2005); (3) 教育水平, 包括“没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及以上”五项, 其中以“没上过学”为参照组; (4) 配偶情况, 有配偶取值为 1, 无配偶(包括未婚、离异、丧偶)取值为 0; (5) 政治面貌, 主要以是否党员来划分, 党员取值为 1, 非党员取值为 0; (6) 收入, 这是一个连续变量。在问卷中, 依靠被调查的自我填答获得。

2. 社区满意度

由于城市建设和资源分布的差异会对一个社区所拥有的资源产生影响, 这些资源包括社区的硬件设施资源和服务性项目资源。硬件设施资源包括环境卫生、治安、服务设施、活动场所、交通条件等; 服务性资源包括文娱活动、体育活动、慈善活动、教育培训等。这些资源分布的差异可能进而影响到居民的社区参与和社区认同。因此在操作化中, 我们将其分为两部分, 以社区满意度作为社区资源的衡量标准。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 社区居民对于二者的使用和参与反映了这两部分资源的丰富性; 其二, 从量化的角度, 我们无法对不同社区的资源作出具体的量化评估, 而社区居民的生活体验可以从一个侧面将这些资源差异状态反映出来。我们将社区资源各项目由居民进行评估, 量表测量由“很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很不满意”构成, 我们对其赋分后进行了因子分析, 如表 3 所示, 得到了“社区满意度”这一因子。

表 3 社区满意度因子

项 目	社区满意度	共 量
社区环境卫生	. 810	. 656
社区治安	. 821	. 674
社区服务	. 861	. 742
社区活动场所	. 833	. 695
社区交通条件	. 687	. 472
特征值	3. 238	3. 238
平均方差	64. 765(%)	64. 765(%)

四、研究发现: 自然社区与行政社区的转变

(一) 社区与邻里

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可用其获得社会支持的来源来描述(Wellman, 1982: 63)。从问卷资料来看, 城中村、老城区和商品住宅区的居民在寻求社会支持时都一致倾向于家人、亲戚及同学、朋友(见表 4)。

在上述为城市居民提供社会支持的个人关系网络成员中, 有多少居于同一社区呢? 也就是说, 居民的个人社会网络与他们所居住的行政社区在空间上是否重合呢? 从图 1 看, 居民的大部分亲友其实居于同一社区中。也就是说, 城市居民基本的社会关系网络与行政社区在空间上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合。

但是, 三类社区居民社会网络与行政社区在空间上重合的程度是不同的。从图 1 看, 城中村的重合程度最高, 达到 70% 以上, 远远超过其他两种类型。老城区的重合程度居中, 在 50—70% 之间, 商品住宅区的重合程度最低, 处于 40—60% 之间。这反映出从城中村到商品住宅区, 随着居民在社区居住时间的下降, 居民的社会网络逐渐从社区内向社区外扩散。在表 1 中, 邻居关系在三种类型的社区居民的社会支持中都不具有重要地位。但图 1 反映出, 实际上不少亲友也是邻居。也就是说, 中国城市社区中邻里关系有相当部分是由亲属和家人构成的, 同时也包括了同学、朋友关系, 即邻里并非仅仅是一个具有相同居住地域空间的群体, 而是一个包含了多重社会关系的群体。表 4 与图 1

表 4 三类社区社会支持网络关系构成 (%)

支持类型 \ 关系类型		家人	亲戚	同事	邻居	同学、朋友	同乡	社团
城中村	情绪低落	57.0	5.0	3.7	3.3	30.6	.4	.0
	金钱需求	54.2	37.5	.8	.4	7.2	.0	.0
	婚姻情感	39.1	21.3	2.7	1.8	33.8	1.3	.0
	家庭重大事件	48.1	27.5	2.6	.0	18.9	1.7	1.3
	工作问题	61.8	5.4	10.8	.5	20.6	.0	1.0
老城区	情绪低落	56.5	5.1	4.2	2.3	31.5	.5	.0
	金钱需求	61.2	22.8	2.7	.0	12.5	.0	.9
	婚姻情感	38.6	23.8	2.5	.0	32.7	.0	2.5
	家庭重大事件	42.1	26.2	3.3	.9	20.1	.0	7.5
	工作问题	52.4	8.3	14.3	.0	24.4	.0	.6
商品住宅区	情绪低落	52.7	4.0	5.4	.4	37.1	.4	.0
	金钱需求	78.6	11.4	.9	.5	8.6	.0	.0
	婚姻与情感	37.9	14.7	3.2	.0	44.2	.0	.0
	家庭重大事件	53.6	14.3	2.6	.0	26.5	.0	3.1
	工作问题	60.2	4.1	9.4	.0	26.3	.0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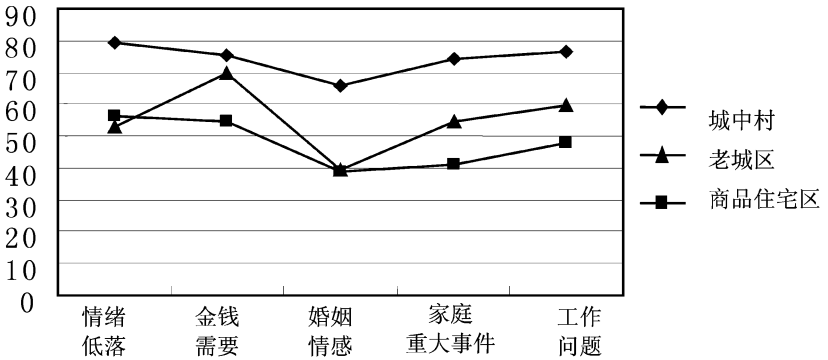


图 1 处于同一社区的网络成员比例 (%)

的差别也反映出不少城市居民把邻居视为单纯的同地而居的人, 与自己没有比较亲近的个人关系。即使如此, 居民与自己的邻居也有较多

的交往互动。表 5 中三个问题用以反映不同的交往深度以及由此而建立的信任程度。从表 5 来看, 三个类型社区中的大部分居民都认识邻居, 但城中村社区居民的相互熟悉程度及信任程度比商品住宅区高得多。在商品住宅区, 居民与邻居关系仅限于互相认识, 超过一半居民不作互相拜访, 而相信会获得互相帮助的也就不足一半。邻居的关系同样反映居民个人关系网络的扩散性。

表 5 不同类型社区居民的邻居网络 (%)

邻居网络		社区类型		
		城中村	老城区	商品住宅区
您是否认识邻居?	认识	98.1	90.8	77.8
	不认识	1.9	9.2	22.2
是否拜会过您的邻居?	有	77.5	65.3	45.4
	没有	22.5	34.7	54.6
当需要时, 是否会得到邻居帮助?	会	73.3	65.7	47.7
	不会	6.3	11.1	5.8
	不知道	20.4	23.2	46.5

都市化并没有以任何替代方式削弱人际联系, 而是转变了联系方式(Tsai & Lee, 1982)。从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来看, 城中村、老城区和商品住宅区经历城市化的时间和城市化的程度是渐次递增的, 社区的异质性也是渐次增强的。上面的分析显示, 随着城市化程度的加深和异质性增强, 个人关系逐渐超越社区的范围, 来自邻里关系的社会支持减弱。

基于表 6 三个城市社区样本对于城市居民社会支持网络中社区支持选择的数据分析, 比较明显地显示出以下特点: 1. 社区居民情绪低落时, 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选择来自社区内的社会支持。小学文化程度的社区居民比没上过学的社区居民更倾向于选择来自社区外的社会支持。老城区、商品住宅区的居民与城中村居民相比较, 更倾向选择来自于社区外的社会支持。2. 社区居民需要经济帮助时, 个体层次变量对于是否选择社区内的社会支持并无重要影响。而老城区的社区居民比城中村更加倾向于选择来自社区之外的社会支持。3. 社区居民需要婚姻或感情方面的社会支持时, 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选择来自社

表 6 影响居民社会支持网络中社区支持选择的因素分析(Logistic Regression, N = 748)

	情绪低落		金钱帮助		婚姻情感		家庭重大事件		工作问题	
	β	SE	β	SE	β	SE	β	SE	β	SE
男性 ^a	.497***	(.207)	.191	(.196)	.403*	(.206)	.221	(.208)	.235	(.219)
小学 ^b	1.614***	(.546)	.367	(.424)	.262	(.469)	.264	(.474)	.377	(.573)
初中	.268	(.468)	.085	(.436)	-.009	(.480)	.057	(.483)	.386	(.555)
高中	.313	(.462)	.176	(.432)	-.260	(.475)	-.776	(.478)	-.123	(.543)
大专及以上	-.050	(.518)	-.030	(.493)	-.678	(.541)	-.661	(.545)	-.290	(.599)
有配偶 ^c	.200	(.277)	-.346	(.277)	-.211	(.294)	-.467	(.309)	.487	(.303)
党员 ^d	-.224	(.377)	-.204	(.369)	-.463	(.428)	.011	(.399)	-.078	(.411)
老城区 ^e	1.090***	(.270)	.789***	(.249)	1.051***	(.259)	1.210***	(.265)	1.064***	(.287)
商品住宅区	.845***	(.288)	.016	(.286)	.611**	(.286)	.239***	(.105)	.543*	(.322)
年龄	.055	(.037)	-.007	(.036)	.074*	(.042)	.062	(.042)	.019	(.041)
年龄平方	.000	(.000)	.000	(.000)	-.001	(.000)	-.001	(.000)	.000	(.000)
收入	.001	(.001)	.001	(.001)	.000	(.000)	.001	(.001)	.000	(.000)
常数	.022	(.944)	1.654	(.929)	-.608	(1.014)	.592	(.997)	.232	(1.067)
Pseudo R ²	.168		.048		.128		.131		.096	
Log-Likelihood	610.618		653.039		592.362		575.814		515.033	

注：a 女性为参照组；b 没上过学为参照组；c 无配偶为参照组；d 非党员为参照组；e 城中村社区为参照组。

* p < .10; ** p < .05; *** p < .01(双尾检定)。

表 7 影响城市居民社会支持网络中社区支持选择的因素分析(Logistic Regression, N = 478)

	情绪低落		金钱帮助		婚姻情感		家庭重大事件		工作问题	
	β	SE	β	SE	β	SE	β	SE	β	SE
性别 ^a	-.288	(.236)	-.278	(.241)	-.286	(.261)	-.122	(.254)	.401	(.267)
小学 ^b	1.414**	(.661)	.557	(.628)	1.134*	(.690)	.802	(.699)	1.576*	(.935)
初中	.597	(.605)	.564	(.621)	.824	(.693)	1.038	(.691)	1.336	(.819)
高中	.378	(.579)	.210	(.589)	.033	(.672)	.273	(.677)	.720	(.790)
大专及以上	.116	(.627)	.142	(.640)	-.039	(.726)	.449	(.729)	.491	(.830)
有配偶 ^c	-.159	(.331)	-.700**	(.351)	-.716**	(.389)	-.885**	(.397)	.204	(.380)
党员 ^d	-.238	(.397)	-.476	(.405)	-.682	(.514)	.020	(.444)	-.156	(.463)
商品住宅区 ^e	.194	(.246)	.941***	(.263)	.523	(.282)	.948***	(.287)	.505	(.2914)
年龄	.076*	(.045)	.026	(.045)	.132**	(.064)	.108*	(.058)	.015	(.052)
年龄平方	-.001	(.000)	.000	(.000)	-.001*	(.001)	-.001*	(.001)	.000	(.000)
收入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常数	-1.545	(1.209)	.139	(1.256)	-3.138	(1.533)	-2.585	(1.478)	1.202	(1.504)
Pseudo R ²	.085		.061		.106		.084		.064	
Log-Likelihood	446.560		422.605		361.422		371.092		333.699	

注: a 女性为参照组; b 没上过学为参照组; c 无配偶为参照组; d 非党员为参照组; e 老城区为参照组。

* p < .10; ** p < .05; *** p < .01(双尾检定)。

区内的社会支持。同时,社区居民的年龄越大,越倾向于选择来自于社区之外的感情支持。而老城区、商品住宅区的居民与城中村居民相比较,同样也更加倾向于选择来自社区外的社会支持。4. 当面临家庭比较重大的事件时,老城区、商品住宅区的居民与城中村社区居民相比较,更倾向于来自社区外的社会支持。5. 当社区居民在工作方面出现问题时,老城区、商品住宅区的居民都更加倾向选择来自于社区之外的社会支持。

在表7中,当将老城区与商品住宅社区进行比较分析时,我们发现了以下几个特点:1. 在社区居民情绪低落、婚姻情感、工作问题的支持网络中,小学文化程度的比没上过学的社区居民更倾向于得到来自社区之外的社会支持。2. 在社区居民金钱帮助、婚姻情感、家庭重大事件支持网络中,无配偶的比有配偶的社区居民更倾向于得到来自社区之外的社会支持。3. 在社区居民金钱帮助、家庭重大事件这两种具有工具性的社会支持网络中,老城区比商品住宅社区居民更倾向于得到来自社区内的社会支持。4. 在社区居民情绪低落、婚姻情感、家庭重大事件社会支持网络中,居民的年龄越大越倾向于得到来自社区之外的社会支持。

综合分析上述数据结果,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结论:从现代化与城市化的角度来说,城市化和现代化水平较高的行政社区中,其居民的社会支持往往来自于社区之外。尤其是将老城区与城中村社区进行比较,老城区的社区居民在社会支持的五个方面都倾向于选择来自社区之外的社会支持。将商品住宅区与城中村社区相比较,除了金钱帮助网络外,商品住宅区的居民更倾向于选择来自社区之外的社会支持。将老城区与商品住宅区比较,如表7所示,在城市居民的工具性社会支持类型的网络中,老城区的居民比商品住宅区的居民更加倾向于选择来自社区内的社会支持。尤其是在金钱帮助和家庭重大事件这样能够提供具体工具性的支持网络,老城区居民与商品住宅社区居民比较显著性较高。因此,我们的假设1和推论1基本得到了印证,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推论1的结论,即在行政社区基础上,随着城市化程度加深,个人的社会支持网络将逐渐从社区之内扩散至社区之外。但扩散并不是绝对一致的,个人的工具性社会支持网络的扩散先于情感性社会支持网络。

(二)社区认同

社区的地域性不仅包含物理空间的意义,还具有其社会意义。这种社会意义首先表达了对于地域空间的认同,许多人文生态学和社会学者强调了这种社区认同的观点。一个群体关系的空间是一个包含了意义生产的物理和文化的结晶,这种意义生产则是一种以某种方式将人们与空间相联系,同时使得人们产生了对于社区空间的特殊情感和依恋(Brower, 2000: 43; Fellin, 2001: 49; Lepofsky & Faser, 2003; Martin, 2003; Mitchell, 2003: 211)。卡萨达和贾诺维茨提出了社区研究的两种模型。第一种为线性发展模型,这种模型假设了扩张的社区人口规模和密度是决定社区行为的主要外生变量,例如沃思的研究(Hauser, 1965: 1-48; Morris, 1968; Fischer, 1972)。而第二种则为系统模型,在这种模型中,社区被认为是一个包含朋友和亲属关系网络以及根植于家庭生活和持续社会化过程中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社群(Hawley, 1950; Hunter, 1974)。因此,他们将居住时间、人口规模和密度作为重要的自变量,研究了居民的社区认知和情感以及当地社会关系网络。研究结果表明,事实上居民的居住时间比人口规模和密度更加重要,人口规模和密度增长并没有带来亲属和朋友关系的减弱和社区情感的降低,居住时间才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他们进而分析沃思所观察的正处于大量新移民涌入美国芝加哥的时期,沃思忽视了时间对于同化的效应,事实上当控制了居住时间,沃思所强调的人口结构因素的影响消失了(Kasarda & Janowitz, 1974)。萨普森认为居住时间的本质在于反映了社区居民的稳定性,使得社区水平的居民关系得以有效维持,从而发挥了促进个体整合于社区的核心作用。因此在研究中,他将社区居民稳定性作为重要变量,混合了线性模型和系统模型,检验了个体和社区层次因素对于个体社区情感的影响(Sampson, 1988)。然而,萨普森的研究并没有回答社区居民何种层面的关系使得个体产生了对于社区的情感和认同。韦尔曼则将居民的社会网络作为社区研究的核心,细化了社区居民社会网络的多个方面。但是韦尔曼本身也在对“把个人网络当作社区问题”的评述中谈到了这种研究取向忽略了人们在其居住与社会空间中必须面对的生态学设置,而将一些基于空间基础上的认同排除在外了(Wellman et al., 1988: 22)。因此,本文的研究将个体社区层次关系网络细化,进一步探寻不同的网络类型对于社区居民认同感的

影响。

表 8 显示了在不同社区类型中居民社区认同程度的均值差异。我们可以明显看到, 城中村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要高于其他两类社区, 其均值为 64.76。同时, 我们观察老城区与商品住宅区居民的社区认同均值, 商品住宅区居民的社区认同略高于老城区居民。事实上, 前文的研究表明, 老城区与商品住宅区相比, 老城区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络更倾向于在社区之内, 按照我们提出的推论 2 的逻辑, 老城区居民的社区认同应高于商品住宅区居民。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事实与逻辑的不一致呢? 这就需要我们细化社会支持类型, 以搞清哪些方面对社区认同产生了影响, 从而清晰化变量间的关系结构。通过表 8 中对不同网络类型中支持网络在社区内和社区外的居民社区认同均值比较我们发现, 不同类型网络皆在社区内者的社区认同程度要高于社区外者。因此为了控制不同社区层次和个体层次变量对社区认同的作用, 我们分别将五种支持网络加入回归方程模型中, 来探析居民社区层次网络与社区认同的内在关系。

表 8 社区认同

社区类型		均值	标准差
城中村		64.76	17.64
老城区		62.50	18.33
商品住宅区		62.79	21.71
社会支持的类型/来源			
情绪低落	社区内	64.54	19.91
	社区外	61.89	19.16
金钱帮助	社区内	64.96	20.43
	社区外	62.15	18.27
婚姻情感	社区内	64.60	18.90
	社区外	60.07	19.72
家庭重大事件	社区内	64.99	18.88
	社区外	62.13	19.62
工作问题	社区内	68.56	18.85
	社区外	58.63	17.86

五个线性回归方程模型(见表 9)表明了以下几方面的结论。第一, 在个体层次变量上, 女性的社区认同程度要高于男性。教育水平越高, 收入水平越低者, 社区认同程度越高。而其他配偶状况、是否党员、

表 9 影响城市居民社区认同程度的因素分析(Linear Regression N=748)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Model 5
性别 ^a	-2.220 (2.294)	-2.204 (2.264)	-4.021 (2.329) *	-4.194 (2.355) *	-3.419 (2.381)
小学 ^b	8.938 (5.502)	8.943 (5.232)	8.526 (5.563)	9.709 (5.279) *	17.313 (6.761) **
初中	3.225 (5.449)	1.457 (5.305)	1.958 (5.579)	2.967 (5.223)	9.558 (6.534)
高中	7.091 (5.346)	5.778 (5.178)	6.416 (5.479)	5.124 (5.179)	11.367 (6.384) *
大专及以上	6.300 (5.941)	5.571 (5.741)	6.568 (6.102)	5.189 (5.782)	11.334 (6.855) *
有配偶 ^c	.131 (3.143)	1.116 (3.284)	1.498 (3.255)	2.148 (3.395)	4.714 (3.429)
党员 ^d	1.334 (4.270)	1.873 (4.324)	.898 (4.265)	2.587 (4.509)	5.222 (4.593)
年龄	-.295 (.426)	-.406 (.435)	-.323 (.434)	-.612 (.448)	-.390 (.456)
年龄平方	.003 (.004)	.004 (.004)	.003 (.004)	.006 (.004)	.005 (.004)
收入	-.002 (.001) ***	-.001 (.001) *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社区满意度	-.033 (.053)	-.022 (.053)	-.036 (.054)	.011 (.055)	-.017 (.058)
情绪低落 ^e	-4.698 (2.253) **	—	—	—	—
金钱帮助	—	-2.439 (2.331)	—	—	—
婚姻情感	—	—	-4.442 (2.363) *	—	—
家庭重大事件	—	—	—	-3.519 (2.501)	—
工作问题	—	—	—	—	-11.954 (2.536) ***
常数	70.721 (11.398) ***	70.859 (11.448) ***	70.156 (11.664) ***	74.774 (11.804) ***	65.907 (12.543) ***
R ²	.07	.065	.067	.043	.046
F 值	2.822	2.688	2.505	2.587	2.517

注: a 女性为参照组; b 没上过学为参照组; c 无配偶为参照组; d 非党员为参照组; e 支持网络在社区内为参照组。

* p < .10; ** p < .05; *** p < .01(双尾检定)。

年龄因素对于社区认同并无统计显著性。第二,社区满意度对居民认同不具有相关性。因此居民对于社区资源的评价与对地域社区的情感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心理结构。第三,在情绪低落、婚姻情感、工作问题这三个网络类型中,得到来自社区内的社会支持者的社区认同程度要高于来自社区之外者,而在金钱帮助和家庭重大事件这两个工具性社会支持网络类型中,其支持来源对于社区认同并无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当社区居民的情感性支持网络(情绪低落、婚姻情感、工作问题)越倾向于在社区之内时,则其社区认同程度越高。这样当我们返回到前文中老城区与商品住宅区居民社区认同的均值比较时,可以判断得出两类社区居民情感性支持网络并无明显差异。这恰恰与我们前文对于推论 1 的统计结论相一致,进一步证实了社会支持网络分析在解释自然社区存在上的理论效度。因此我们基本印证了推论 2,但是需要将推论 2 进行修正,即由于个人情感性社会支持网络逐渐从社区内转移到了社区外,居民对于自身所在社区的认同程度降低。

(三)社区参与^①

社会网络理论和以往社区研究指出,社区内个人关系越亲密的网络成员的互动频率越高,从而提高了社区层次活动的参与程度(Warren, 1958; Kasarda & Janowitz, 1974; Christenson, 1984; Sampson, 1988, 1991, 2004, 2005; 林南, 2006: 37—38)。因此由于人口流动、居住方式、社区结构与环境不同,带来人们关系互动的差异和社区参与程度的高低(Fellin & Litwak, 1963; Tomeh, 1964; Taub et al., 1977; Haines et al., 1996)。我们从这个逻辑推展出去,关系社区和以居住地域划分的行政社区在空间上的重叠程度越高,居民的社区参与程度也越高。

从表 10 中我们可以看出,将三种类型城市社区进行居民的社区参与比较,呈现出比较明显的梯度变化。城中村居民的社区参与因子分值的均值最高,达到了 56.1,远远高于老城区和商品住宅区。老城区和新商品住宅区的分值依次为 36.3, 32.0。从社区参与因子分值来看,

^① 有研究表明,社区认同与社区参与具有相关关系,社区居民的认同程度越高,对其所在社区活动的参与程度越高,反之也成立(单菁菁, 2005: 121—129; 胡荣, 2006)。根据林南对霍曼斯互动理论的分析,个体互动越多,越可能共享情感,而共享情感越多,它们越可能互动和参与活动(林南, 2006: 37—38)。因此认为二者谁决定谁,本身存在着循环论证的问题。在本文中,我们将二者视为显示自然社区存在的两个相对独立的特征。

刚刚进入城市行政制度改造和城市生活圈的城中村居民的社区参与程度最高,而商品住宅区居民的社区参与程度最低。而将社会支持网络类型中获得来自社区内支持和社区外支持的居民的社区参与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获得来自社区内社会支持的居民比获得来自社区外支持的居民的社区参与程度要高。为了更好地解释支持网络类型和来源对于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我们控制了一些个体和社区层次变量。

表 10 三种类型社区参与比较

社区类型		均值	标准差
城中村		56.1	20.5
老城区		36.3	15.5
商品住宅区		32.0	15.8
社会支持的类型/来源			
情感需求	社区内	88.61	11.93
	社区外	82.17	18.32
金钱帮助	社区内	86.76	15.10
	社区外	83.42	16.97
婚姻情感	社区内	85.51	16.22
	社区外	81.89	17.61
家庭重大事件	社区内	85.80	15.29
	社区外	82.42	17.63
工作问题	社区内	85.43	16.21
	社区外	81.32	17.89

如表 11 所示,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1. 个体层次变量在五个模型中对社区参与程度的影响并不明显,只有在两个模型中,小学文化程度的社区居民比没上过学的社区居民社区参与程度高,以及收入越高的居民社区参与程度越高。2. 社区满意度这一变量对于社区参与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我们可以得到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程度与该社区居民对于社区硬件和软件服务设施的满意程度并不具有相关性的结论。3. 在分别加入社会支持网络的五种类型的不同模型中,都表现出了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络在社区内者要比在社区外者社区参与程度更高。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的推论 3 得到了证实。综合推论 2 与推论 3,本文假设 2 得到了证明。

表 11 影响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的因素分析(Linear Regression N= 748)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Model 5
性别 ^a	-. 380 (1. 537)	-. 085 (1. 590)	-. 242 (1. 720)	-. 373 (1. 695)	-. 076 (1. 854)
小学 ^b	-4. 265 (3. 661)	-5. 858 (3. 550) ***	-6. 316 (3. 891)	-7. 643 (3. 703) **	-7. 444 (4. 674)
初中	-2. 047 (3. 637)	-2. 324 (3. 584)	-1. 929 (3. 913)	-4. 092 (3. 708)	-3. 974 (4. 552)
高中	-2. 493 (3. 544)	-2. 547 (3. 461)	-2. 188 (3. 808)	-5. 412 (3. 633)	-3. 267 (4. 450)
大专及以上	. 588 (3. 948)	1. 294 (3. 846)	1. 404 (4. 311)	-1. 360 (4. 096)	-. 205 (4. 892)
有配偶 ^c	. 733 (2. 181)	. 671 (2. 289)	. 123 (2. 421)	1. 908 (2. 421)	3. 301 (2. 595)
党员 ^d	. 704 (2. 970)	. 390 (3. 111)	2. 712 (3. 382)	2. 533 (3. 337)	1. 858 (3. 634)
年龄	. 036 (. 286)	-. 009 (. 283)	. 080 (. 313)	-. 060 (-. 296)	-. 121 (. 338)
年龄平方	. 001 (. 003)	. 001 (. 003)	. 000 (. 003)	. 001 (. 003)	. 001 (. 003)
收入	. 001 (. 001)	. 001 (. 001)	. 000 (. 001)	. 001 (. 001) *	. 001 (. 001) *
社区满意度	-. 012 (. 038)	-. 008 (. 038)	-. 006 (. 041)	. 037 (. 042)	. 019 (. 047)
情绪低落 ^e	-6. 296 (1. 688) ***	—	—	—	—
金钱帮助	—	-3. 146 (1. 650) **	—	—	—
婚姻情感	—	—	-2. 172 (1. 734) *	—	—
家庭重大事件	—	—	—	-2. 432 (1. 762) *	—
工作问题	—	—	—	—	-2. 885 (1. 913) **
常数	86. 181 (7. 907) ***	84. 826 (7. 956) ***	80. 376 (8. 748) ***	84. 035 (8. 456) ***	84. 301 (9. 676) ***
R ²	. 062	. 042	. 043	. 046	. 050
F 值	2. 555	2. 536	2. 695	2. 639	2. 553

注: a 女性为参照组; b 没上过学为参照组; c 无配偶为参照组; d 非党员为参照组; e 支持网络在社区内为参照组。

* p<. 10 ** p<. 05; *** p<. 01(双尾检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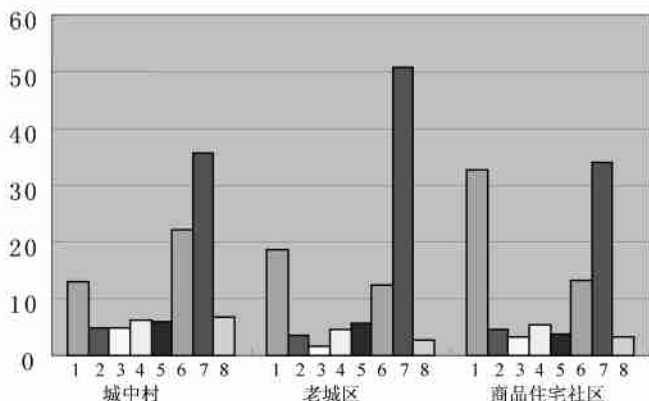
五、结论与讨论:城市社区的变异

我们从居民的个人关系网络、社区参与和社区认同三个角度考察了今天中国城市社区存在的现实状态,可以证实,社区作为一个居民关系结构相对密集的空间或社会单位仍然具有一定的存在现实性,即是说,居民的个人关系结构与具体空间重合的、有一定程度共同参与和认同的社区仍然存在于今天的中国城市中,尽管中国城市正在经历剧烈快速的空间变化、人口流动、制度变革过程,但由于社区原有制度因素的影响,传统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仍未消失。

然而,上述数据分析也清楚地显示出,传统意义上的社区已经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1)居民个人关系网络发生空间上的扩散,逐渐超越所居住的空间范围。(2)邻里关系趋向疏离。在行政社区基础上,由于城市化,个人的社会支持网络将逐渐从社区内转移至社区外,而城市的现代化,则使得个人的工具性社会支持网络逐渐从社区内转移至社区外。(3)显示自然社区存在的社区认同和参与减弱。由于个人情感性社会支持网络逐渐从社区内转移到了社区外,居民对于自身所在社区的认同程度降低。由此可见,由于卷入城市化和现代化的程度不同,今天中国城市中不同类型的社区是有差别的,具有不同的特质。

在沃斯和齐美尔的论述中,现代化大都市生产的专业分工和生活方式破坏了家庭和社区的纽带,造就了都市人的个人主义(沃斯,2007:1—15;齐美尔,2007:1—15);与此同时,个人“只有通过加入由兴趣爱好相似的人结成的群体才能实现自身的完满”(沃斯,2007:15;齐美尔,2007:15)。然而,这种对集体活动的参与是基于个体选择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与传统社区中“个体淹没于群体之中”完全不同。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也清楚地反映出这一点。图2反映了三类社区居民社区参与动机的差别。从城中村到新商品住宅区,居民对个人兴趣的强调渐次递增,这种变化反映出,随着城市化程度加深,城市居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个人利益与社区的关联性减弱,他们参与社区活动不是必需的,而是可选择的。换句话说,城市居民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个人性而非社区性。

今天中国的城市无疑正在经历急剧的空间扩张、人口流动、空间重构和制度改革,我们的研究显示,这种社会环境的变化并未把业已形成



1. 对活动有兴趣 2. 可以加强邻里关系 3. 打发闲暇时间 4. 喜欢参加集体活动
5. 联络感情 6. 活动与自己的利益有关 7. 参加社区活动是居民的义务 8. 其他

图2 三类社区居民社区参与的动机比较(%)

的社区彻底摧毁,从居民的个人关系网络及其空间分布、居民的社区参与和社区认同三方面衡量,社区作为一个有限的邻里空间在城市基层和居民的认知中仍是一个客观实在。然而,由于卷入城市化的程度不同,即使在相同城市,不同社区的存在形态及居民与社区的关系也是有差别的,显示出空间变化和人口流动越大,社区形态和居民与社区之间关系的变化越大。总的来说,社区变化呈现出以下倾向:居民的关系网络向社区外扩散,家庭和邻里关系不再是社会支持的唯一来源,社区参与个人化,社区认同减弱,社区参与的选择趋向个人化而非集体化。

城市社会学关于社区消亡、继存和解放的论辩指出城市化改变了人际关系结构,邻里关系不再重要,而具有特定空间范围的社区也不再重要。本文的分析表明,由于中国城市形成的历史和美国不同,中国城市社区的变化受到很强的国家制度因素影响,因此今天中国城市社区的空间因素仍然重要,邻里关系仍然是城市居民个人关系网络的主要成分和获得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之一。

城市社区存在的现实性和邻里关系的重要性或多或少可以证明中国城市基层推行社区建设运动的合理性。但是本文认为以下方面更值得注意:(1)老城区与城中村在统计数值上的差异反映,即使在形成历史较长的城区,居民个人关系的网络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扩散。也就是说,随着城市化程度的加深,以邻里关系为基础的传统型社区走向衰落

是不可避免的。(2)居民的社区参与趋向个性化、整体参与程度不高及缺乏主动性表明,行政社区作为城市居民共同居住的空间,由于多种城市化及制度改革因素的影响,不一定是居民利益的共同体。(3)不同类型城市社区在结构和特点上都存在较大差距,基层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治推动过程特别需要注意不同社区的特质。(4)商品住宅区的资料分析显示出居民关系网络向社区外空间扩散和居民社区参与的个人化倾向有某种相关性,暗示扩散程度越高、邻里关系越弱,居民的社区参与越趋向于个体化。传统的社区建设模式立足于假定社区团体和邻里关系是社区团结的基础,但是上述数据分析已经揭示出中国城市邻里社区衰落的必然趋势,那么,以特定地域和特定居住人口为对象来投放公共资源的现行社区建设模式将越来越缺乏效率。社区建设作为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在方式方法上需要更多的智慧和技巧。同时,社区建设作为一种基层社会整合方式的设计应该考虑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让不同社区、由兴趣共同的居民组成的群体在更大程度上分享公共资源,使基层整合真正变成居民自己的事而不仅仅是政府的事。

参考文献:

- 边燕杰、李煜, 2001,《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清华社会学评论》第2辑。
- 边燕杰、刘勇利, 2005《社会分层、住房产权与居住质量——对中国“五普”数据的分析》,《社会学研究》第3期。
- 蔡禾、叶保强、邝子文、卓惠兴, 1997,《城市居民和郊区农村居民寻求社会支援的社会关系意向比较》,《社会学研究》第6期。
- 曹子玮, 2003,《农民工的再建构社会网与网内资源流向》,《社会学研究》第3期。
- 胡荣, 2006,《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地域性自主参与——影响村民在村级选举中参与各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第2期。
- 李友梅, 2002《基层社区组织的实际生活方式——对上海康健社区实地调查的初步认识》,《社会学研究》第4期。
- 林南, 2006,《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齐美尔, 2007,《大都市和精神生活》,载《阅读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赵宝海、魏霞译,《都市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三联书店。
- 丘海雄、陈健民、任焰, 1998《社会支持结构的转变:由一元到多元》,《社会学研究》第4期。
- 单菁菁, 2005,《社区情感与社区建设》,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孙立平, 2001,《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发育》,《学海》第4期。
- 王春光, 2000,《流动中的社会网络:温州人在巴黎和北京的行动方式》,《社会学研究》第3期。
- 沃斯, 2007,《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载《阅读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都市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三联书店。

- 张其仔, 1999《社会网与基层经济生活——晋江市西滨镇跃进村案例研究》,《社会学研究》第3期。
- 张文宏、阮丹青, 1999,《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社会学研究》第3期。
- 张文宏、阮丹青、潘允康, 1999《中国农村的微观社会网和宏观社会结构》,《浙江学刊》第5期。
- 张友琴, 2001,《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的城乡比较研究——厦门市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第4期。
- Brower, S. 2000. *Good Neighborhoods: A Study of In-town and Suburban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Westport, CT: Praeger.
- Christenson, J. A. 1984, "Gemeinschaft and Gesellschaft: Testing the Spatial and Communal Hypotheses." *Social Forces* 63.
- Fellin, Phillip 2001, *The Community and the Social Worker*. Itasca, IL: F. E. Peacock.
- Fellin, Phillip & Litwak Eugene 1963 "Neighborhood Cohesion Under Conditions of Mobi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8.
- Fischer, Claude S. 1972,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A Review and an Agenda."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2.
- 1982a, *To Dwell among Friends: Personal Networks in Town and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2b, "The Contexts of Personal Relations: An Exploratory Network Analysis." Working Paper 281. Berkeley: Institute of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1995 "The Subcultural Theory of Urbanism: A Twentieth-Year Assess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 Fraser, J. 2006 "The Relevance of Human Geography for Studying Urban Disasters." *Space and Culture* 9.
- Gans, Herbet 1962, *The Urban Villagers*. New York: Free Press.
- Haines Valerie A., Jeanne S. Hurlbert & John J. Beggs 1996, "Exploring the Determinants of Support Provision: Provider Characteristics, Personal Networks, Community Contexts, and Support Following Life Event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37.
- Hauser, Philip M. 1965, "Urbanization: An Interview." In Philip. M. Hauser & Leo F. Schnore (eds.), *The Study of Urbaniza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 Hawley, Amos 1950. *Human Ecology: A Theory of Community Structure*. 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
- Hunter, Albert 1974, *Symbolic Communities: The Persistence and Change of Chicago's Local Communi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asarda, J. D & Morris Janowitz 1974, "Community Attachment in Mass Socie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9.
- Lepofsky, Jonathan & James Fraser 2003, "Building Community Citizens: Claiming the Right to Place Making in the City." *Urban Studies* 40.
- Martin, D. 2003, "'Place-framing' as Place-making: Constituting a Neighborhood for Organizing and Activism."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93.
- Mitchell, Don 2003, *The Right to the Cit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Fight for Public Space*. New York:

Guilford.

Morris, R. N. 1968, *Urban Sociology*.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Sampson, R. J. 1988 "Local Friendship Ties and Community Attachment in Mass Society: A Multilevel Systemic Model."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3.

—— 1991, "Linking the Micro- and-Macrolevel Dimensions of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 *Social Force* 70.

—— 2004 "Seeing Disorder: Neighborhood Stigma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Broken Windows'."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67.

—— 2005, "Civil Society Reconsidered: The Durable Nature and Community Structure of Collective Civic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1.

Simmel, Georg 1950, "The Metropolis of Mental Life." In Kurt Wolf (ed. & trans.),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Glencoe, Ill: Free Press.

Taub, Richard P., George P. Surgeon, Sara Lindholm, Phyllis Betts Otti & Amy Bridges 1977, "Urba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Locality Based and Externally Induce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

Tilly, Charles 1973 "Do Communities Act?" *Sociological Inquiry* 43.

Tomeh Aida K. 1964, "Informal Group Participation and Residential Patter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0.

Tsai, Yung-mei & Sigelman Lee 1982, "The Community Question: A Perspective from National Survey Data — The Case of the USA."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

Warren, R. L. 1958,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the Community: Affair in Stuttgart, Germany." *Social Force* 36.

Wellman, Bary 1982, "Studying Personal Communities." In Peter V. Marsden & Nan Lin (eds.),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 1979 "The Community Question — the Intimate Networks of East Yorker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4.

Wellman, Bary, P. Carington & A. Hall 1988, "Networks as Personal Communities." In Wellman B. & Berkowitz S. D. (eds.), *Social Structure: A Network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llman, Bary & S. Wortley 1990, "Different Strokes from Different Folks: Community Ties and Social Suppor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6.

Wirth, Louis 1964, *Louis Wirth on Cities and Social Life*. Selected Papers. Edited and with Introduction by Albert J. Reiss, J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oldoff Rachael A. 2002, "The Effect of Local Stressors on Neighborhood Attachment." *Social Forces* 81.

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黎熙元)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陈福平)

责任编辑: 张志敏

great influences. Compared with others, the survey had the hard-won support from experimental area of Ding County, especially the advantage of talents and finances, all of the which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success of the survey.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survey, both unofficial and official resources were valued and used. Advanced modern survey methods were introduced in this survey, which made the survey become the landmark of the social survey in China. The survey has collected a large number of objective social facts, proposed valuable suggestions on the social reforms, and left us precious traditional cultural heritages, 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ociology.

Community Issue: Change of urban community in China's social transition
..... *Li Xiyuan & Chen Fuping* 192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mmunity issues — community lost, saved, or liberated — of urban sociology in China's social transition.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is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in three communities in Guangzhou city, which proves that the social support network of urban residents has diffused gradually out of the community in which they are living, and it causes the weakness of resident's community identity and participation. In other words, the community as personal network has diffused out of the community as an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state. This implies that the role of contemporary community building would be weaker in the integration of grassroots society in China.

BOOK REVIEW

Follow the Agency to Reassemble the Social:
Reading 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 *Wu Ying, Lu Yuxia, Chen Jiqian & Wang Yige* 218

Social Order Constuction of Classification System:
A review of Mary Douglas,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s* *Zhu Wenbin* 235